

清初浙東 學派論叢

方祖猷 ● 著



清初浙東學派

論 叢

❖ 方祖猷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初浙東學派論叢／方祖猷著．--初版．--臺

北市：萬卷樓發行：三民總經銷，民 85

面； 公分

ISBN 957-739-152-4(平裝)

1. 哲學-中國-清(1644-1912)

127.011

85004682

清初浙東學派論叢

著 者：方祖猷

發行人：許鈺輝

總編輯：許鈺輝

責任編輯：李冀燕

發行所：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7 號 14 樓之 1

電話(02)3216565・3952992

FAX(0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總經銷：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86 號

訂書專線(02)5006600 (代表號)

FAX(02)5164000・5084000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民國 85 年 7 月初版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伍陸伍伍號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本書作者授權出版 翻印必究◎

序

宗 瑞

按我國以地區性學術發展而言，浙東學派的出現是比較早的。南宋以臨安（今杭州）為京都，與政治中心接壤的兩浙東路，人才比較集中，學術發展自比其他區域條件為優厚。以經學（即理學）、史學、文學等方面而言，在兩浙東路的南宋學者均有優異的表現。筆者嘗撰《南宋浙東的史學》（原刊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七十年十月；收入《宋史研究論叢》第三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與《南宋浙東的理學》（原刊杭州大學出版《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一九九五年十月。）申述之。今拜讀方祖猷兄《清初浙東學派論叢》大著，對明末清初的浙東學者在文史哲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深有所感，很自然地會追念宋代兩浙東路諸學者的表現。

方氏此著對清初黃宗羲、萬斯同與全祖望等三位學者在經學、史學與文學等方面的成就多所評述，同時也提及黃百家、萬斯大、呂留良、潘平格、劉獻廷、李文胤與鄭梁等人的貢獻。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字太冲，號南雷，稱梨洲先生，餘姚人，所著《明夷

待訪錄》反映他把握時代思潮的傑出才能。又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鉅著。在寧波創辦甬上證人書院，傳授劉宗周之「蕺山之學」，亦即慎獨之學。他對明季東林學派「尊經」、和復社「復興古學」，頗為重視；至清初，則將經學與經世聯繫起來，成為清初經學的一大特徵。其試圖總結明亡的教訓，可以見之。

萬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字季野，鄞縣人。為黃宗義的弟子，鑽研經史之學，為經世而治史。其史學思想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應徐元文之邀，北上京師，參與纂修明史，嘗云：「但願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報先朝。」（楊無咎《萬季野先生墓誌銘》，萬斯同《石園文集》卷首。）他參與纂修明史，辭謝官職，住在徐氏兄弟在京的碧山堂賓館，「一時修史諸君多從季野折衷」，徐元文「遇有疑誤，輒通懷商。」（韓菼《徐公元文行狀》，錢儀吉《碑傳集》卷十二。）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張玉書與陳廷敬接任明史監修與總裁，斯同被堅留，居室由碧山堂移至江南會館。同年，並應仇兆鰲邀請，在京主講經史之學，每月二、三次，內容包括田賦、兵制、選舉、樂律、郊諦、廟制、輿地、官制、圖書、曆象、河渠、邊務諸端。講會直至他逝世前，歷時十二年，未曾停止。康熙三十五年秋，曾與方苞暢談史法，提出「事信而言文」，博搜資料而裁以實錄。近人顧頤剛稱：「痛故國之淪亡，寄孤懷於筆削，遂以布衣手定『明史』，存一朝之文獻。」（「萬季野先生祠墓落成紀念」，《史地雜誌》一卷二期。）萬氏著作多達三十多種，而以纂修明史之功為最。

全祖望（一七〇五—一七五五），字紹衣，號謝山，鄞縣人。歷康、雍、乾三朝，其史學思想上承黃宗羲、萬斯同。下開章學誠，為浙東學派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繼承唐劉知幾之史才、史學、史識論，統稱之為「史法」，發揚直筆精神。在歷史編纂學上，繼承萬斯同重視史表的思想。他把地方志超出地理志的概念，而與史書聯在一起。嘗云：「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為舊史拾遺。」（『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這對章學誠之方志學不無影響。

全氏不熱衷利祿，其民族思想是服從於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歌頌抵抗外族，對滿清的思想統制表示異議。全氏著作除『鮚埼亭集』外，續修『宋元學案』，功不可沒。並輯『續甬上耆舊傳』一二〇卷，自明隆慶、萬曆以後至清初共一五、九〇〇餘首，短文近百篇，為續李文胤『甬上耆舊傳』而輯，他是文獻學大家之一。浙東地區抗清鬥爭長達二十年，『續甬上耆舊傳』保存了南明魯王時期浙東地區抗清的大量歷史文獻，為研究南明史之寶貴史料。明末東林黨人顧允成以「天崩地陷」四字概括晚明政治形勢，續耆舊傳則從側面以文學方式反映此一形勢，詩人的高風亮節，以其目睹耳聞之賞，補「天崩地陷」時期正史所敘之缺或糾其誤，洵屬難能可貴。

清初浙東學派因黃宗羲的主導，得萬斯同、全祖望等人之繼承與發揚，影響到清代中葉章學誠、邵晉涵等，可謂盛矣。祖猷兄索稿於我，爰簡述浙東學派之淵源，成熟與影響以為應，是為序。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二月五日
於陽明山華岡中國文化大學

自序

方祖猷

清初浙東學派是一個以史學為主，包含哲學、經學、文學乃至自然科學諸種領域，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學派。由於它處在中國行將步入近代的歷史時期，它所反映的學術內容，更引人注目。

一九八一年，我回到故鄉寧波工作，因文獻獲得的難易，我先著手研究全祖望，然後逆推到萬斯同、黃宗羲，再回過頭來研究萬斯大，先後整整十年餘，目前這一本《清初浙東學派論叢》，除其中四五篇外，都是在這段時期發表於各種雜誌和參加有關國際學術會議上論文綜合而成的，打印出來，提供給「一九九三年浙東學術國際研討會」，希冀各位學者予以指正。

清代浙東學派究竟由那些人組成？首先指出這一學術系統的是章學誠，以後梁啟超、劉光漢、章炳麟、周予同等都有所論述。第一個完整地提出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而予以詳盡說明的是陳訓慈先生，他的《清代浙東之史學》，是進一步研究這一學派的重要著作。然自四十

年代金毓黻發表不同的意見後，這一問題，在海外學者中展開過爭論。當時，訓慈先生曾希望我能對此發表看法。我回寧波後思考了一下，回信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探討這一學派組成的人員，不能單看其師承關係，明清時期的學派，究竟與兩漢時期的師法、佛教宗派不盡相同，應在這些學者中發現其學術精神上的共同點和繼承性，才能決定他們是否屬於同一學統。但是我才疏學淺，他們中好些人的學術思想我並未探討過，所以無法對這一爭論發表意見。我回信年餘後，訓慈先生突然去世，我如將來有可能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訓慈先生也無法看到，這是極為遺憾的。

對這本書中所論述的人物是否屬於浙東學派，是沒有爭論的，我僅試圖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向下推，以研究清中葉和晚期的其他人物，以實現訓慈先生對我的期望。

本書之所以能問世，應感謝沈善洪兄的鼓勵，訓慈先生生前的指導，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慶彰先生的熱情推薦，以及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寧波大學圖書館、寧波市圖書館、寧波伏跗室藏書樓為我提供方便，特此感謝。

一九九三年三月

作於寧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目錄

序／宋晞 1

自序 1

一 明清之際的經學思潮和史學思潮 1

二 時代思潮和清初浙東學派的形成

——兼論黃宗羲的教育思想 23

三 黃宗羲若干事迹考證 37

四 天一閣藏《南雷文鈔》中的黃宗羲佚文 47

五 黃宗羲開創浙東學派的基地

——甬上證人書院 65

六 黃宗羲與甬上弟子的學術分歧

——兼論蕺山之學的傳播和沒落 87

七	黃宗義與文昌社	1 1 3
八	黃宗義與呂留良	1 2 5
九	黃宗義與潘平格	1 4 1
十	《明夷待訪錄》考	1 5 5
十一	黃宗義的文學思想	1 6 7
十二	萬斯大的《周官辨非》	
	——兼論其經學的特點及其歷史地位	1 9 1
十三	萬斯大的《春秋》學	2 0 9
十四	萬斯同傳略	2 3 1
十五	萬斯同與劉獻廷等搜集南明文獻述略	2 5 1
十六	萬斯同著述考略	2 6 3
十七	萬斯同在明史館的作用	2 8 9
十八	天一閣藏萬斯同《明史稿》考述	3 0 7
十九	萬斯同的史學思想	3 2 5
二十	萬斯同史學思想中的新因素	3 4 3
二一	萬斯同的史考及其得失	3 6 7
二二	《儒林宗派》及其學術價值	3 8 9

二三	全祖望的史學思想	405
二四	全祖望民族思想辨	423
二五	「天崩地陷」時代的真實寫照(一)	
	——《續甬上耆舊詩》所保存的晚明文獻	439
二六	「天崩地陷」時代的真實寫照(二)	
	——《續甬上耆舊詩》所保存的南明文獻	455

附

錄

章學誠對清初浙東學派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管窺	473
----------------------	-----

一 明清之際的經學思潮和史學思潮

清初浙東學派的學術，與明清之際的經學和史學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一、經學思潮

自從北宋慶曆年間出現疑經風氣後，逐漸發展為刪經、改經，到明中葉王陽明提出「六經之實，具於吾心」①的命題，這一風氣達到了高潮。他的弟子王畿把陸九淵的「六經皆我注腳」的命題，納入王學的心學體系之中，他說：「良知是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注腳』。」②受王畿思想重大影響的李贄把六經與童心對立起來，認為六經的義理讀得越多，童心愈失，他斥責：「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蔽也。」③他不但反對宋儒從六經中發揮義理，而且也不同意王陽明把六經視作「吾心」的常道，這對衝破六經的思想束縛自然是極其猛烈的，其影響所及，冀土六經成了明末一時的風氣，如果按其邏

輯發展，經學就要消亡。

但是，糞土六經，其流弊造成了倫理的虛無主義和學術淺薄，由此王學中另一部分人提出了較溫和的主張，泰州學派的開創者王艮提倡：「以經證悟，以悟釋經」④，進一步提出：「證諸先覺 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⑤的觀點。他所說的「古訓」，即六經。王艮的三傳弟子羅汝芳，從「考諸古訓」出發，反對「謂六經注我，不復更去講究」⑥的現象，明確提出「信古敏求」⑦的主張，認為《四書》、《五經》是「聖賢精蘊之所寄」，可以「明心見道」⑧。他這一提法，已與六經是「吾心之常道」和「六經注我」有區別了，在「吾心」、「我」和六經之間，重心開始向經的方向傾斜。

在王學之外，開晚明實學思潮之端的羅欽順，也提出了「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誤者」⑨的觀點。這句話的前面部分，即道寄於經書之中，與羅汝芳相合，但羅汝芳並不反對「六經注我」，只反對不再講求經書；羅欽順則反對在治經中「師心自用」，即反對「六經注我」，所以後面一段，兩人有差距。這表明在經學復興萌芽時，陽明後學的一部分人和王學以外的人，走著殊途同歸的兩條不同途徑。

走王艮、羅汝芳途徑的是焦竑和陳第。如焦竑贊同王艮的「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指斥漢人注疏為「糟粕」⑩，是明經的障礙，他很強調「悟」的作用，然而，其明經的方法，則主張用「小學一段功夫」⑪，從音韻文字上作考證。走羅欽順途徑的是楊慎，他明確反對「以六經為注腳」⑫，而主張恢復漢儒訓詁之學，「求朱子以前六經」⑬，他首創求古人文

法和音韻入手的小學考證法。在他稍後的歸有光進一步力主區別「講經」和「講道」，認為道既然在經中，何必講道！上述兩條途徑，通過小學考證以明經是一致的，但對漢儒的傳注，則態度不同，前者反對，後者贊同，這其實是對王學的心，即「悟」的作用評價不同而引起的。

晚明實學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東林學派，他們多從王學中分離出來轉而批評王學，繼續了羅欽順的途徑。如顧憲成在揭示《東林會約》的「尊經」時，以「經，常道也」^⑭的命題，代替了王陽明的六經為「吾心之常道」^⑮的命題，一舉而把「吾心」兩字抹去，這反映了經學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變化，即從主觀的闡釋，回歸到客觀的求證，已成為歷史的自覺。顧氏的友人高攀龍以聖人之心代替了「吾心」，明確提出：「返求諸六經」的口號。

到了啓、禎之際，以經世為特點的實學思潮開始高漲，經學經世的目的十分明確，經學的復興也有所發展，這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出現了繼東林學派之後以「復興古學」^⑯為宗旨的復社，所謂的「古學」，即經學。其次，復社的重要人物錢謙益，對宋明經學予以初步總結，明確指出「以漢人為宗旨」^⑰和「正經學」的口號。

最後，復社的另一重要人物方以智，對經學復興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所作的《通雅》集晚明考證學之大成，大大超過楊慎和焦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者對楊慎與焦竑皆有所不滿，但對方以智評價不同，說：「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⑱所以方以智既是集大成

者，又開清初經學的先河。

方以智在小學考證中提倡知古必須疑古，疑古必須考古，考古不能泥古，不讓古人才能不泥古^①，這種推崇獨立思考，不墨守盲從的精神，顯然是宋明疑經思潮和王學的影響所致；但他又反對「糞掃六經，師心杜撰」^②而與王學不同，這又是受當時實學思潮影響所致。所以他的經學，實已開始了王學與實學相結合、兩條治經道路殊途同歸的趨向。他的治經思想為黃宗羲所繼承和發展，他的治經方法，為顧炎武所繼承和發展，他是晚明承前啟後一位重要的經學家。

清初，由於明亡的教訓，實學思潮已成為主要的思潮，心學似乎消失了，然而它仍結合於實學思潮之中，這種情況在經學中也有所反映。我們以顧炎武和黃宗羲為例來分析當時經學復興的兩條途徑。

顧炎武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③的著名命題，後來全祖望歸納為「經學即理學」五字。顧炎武認為：「自八股行而古學廢，〈大全〉出而經說亡。」^④而王學的流行，造成「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⑤的流弊，總之，八股和王學，都使經學和實學廢棄，認為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所以主張以經學代替理學。他繼歸有光和錢謙益區別講經和講道，以講經代替講道之後，明確宣布：「不坐講席，不收門徒」^⑥，不講性命之學，這是他的「經學即理學」命題的本意。

顧炎武在經學上的重大貢獻是他繼楊慎、焦竑、陳第、方以智的小學考證法而發展之，

這就是他的《音學五書》，書中運用了大量的邏輯歸納法，這是他考證經學的主要方法，對以後的乾嘉學派產生重大影響。

黃宗羲是王學的修正者，強調心的作用，主張「以我之心區別天地萬物而為理」^{②⑤}，在治經中提倡：「夫禮以義起，從吾心之安不安者權衡而出之。」^{②⑥}。張邦奇曾批評王陽明「糟粕六經」，黃宗羲頗不以為然，說：「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冤乎？」^{②⑦}。「一先生」指的是朱熹。所以他在治經中強調理性，主張不盲從墨守，大膽衝破舊的傳注的束縛，這顯然受王學的影響所致，但他不主張糞土六經。方以智曾說：「狂子繆民，羣起糞掃六經，師心杜撰」^{②⑧}，黃宗羲贊同他前半句話，也指責：「狂子繆民，羣起糞掃六經」，但在後面不指責「師心杜撰」，而代以「溢言曼辭」^{②⑨}，這一改動說明他並不反對在治經中的「師心」。

黃宗羲在經學中極重視《禮》學，他說：「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大而類裡巡狩，皆為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為實行也。」^{③⑩}他認為鄭玄之失，在於他只專心於箋傳，而忽略三代「帝王大意」；宋儒之失，在於只講「精微之理」，而於禮之節目與典章制度不屑一顧，可他們對漢儒箋傳中的異同混亂又未予考證歸一，這些觀點，又是當時實學思潮在他經學中的反映。

在經與理的關係上，他主張兼而有之，而以前者為主，講經與講道可以並行而不悖，他說：「鑽研服鄭（服虔、鄭玄），函雅故，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③⑪}這顯然取方以智